

· 西江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二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出版社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澳门基金会编
肇庆学院

主编：林有能 吴志良 黎玉琴



· 西江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二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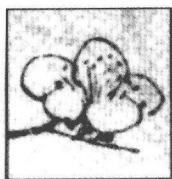
香港出版社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澳门基金会编
肇庆学院

主编：林有能 吴志良 黎玉琴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主编：林有能 吴志良 黎玉琴

出版：香港出版社

地址：Flat6, 9/F, Kenbo Comm.Bldg,

335-339 Queen' s Road W,Hong Kong

网址：Http: //www.hkbooks.com.hk

邮箱：hkbooks@hotmail.com

电话：+852 21161998

传真：+852 21161988

开本：850x1 168 1 / 16

印张：19

字数：323千字

印数：1-1000册

版次：2012年5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78-988-18298-9-4

定价：30.00元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篇 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认知与理解

从基督宗教的第三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汉学的形成

耿 昇 / 3

追随利玛窦 艺苑留芳踪

——写在艾启蒙辞世 230 年之岁

李兰琴 / 29

麦都思与中国天主教传教士

黄美树 / 42

西方传教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王超杰 / 62

第二篇 利玛窦在中国的历史活动

From Macao up to Beijing (1582-1610) – Matteo Ricci and Euro-Jesuit
enterprise in China: Portrait of a Jesuit

Artur K. Wardega / 71

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字号琐谈

庞乃明 / 90

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

黎玉琴 刘明强 / 102

利玛窦在韶关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刘翠平 曾 峥 / 110

利玛窦的韶关居所及其天主教堂建筑风格考

孙宇锋 曾 峥 / 116

明清岭南双城记

彭土生 / 128

第三篇 利玛窦的文化传播

- 数学文化传播的利玛窦模式及其影响 曾 峥 孙宇锋 / 135
- 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发展的重要跳板
——利玛窦在韶州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 李明山 / 147
- 利玛窦与十二等程律的传播 刘树勇 / 156
- 利玛窦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仪器与理论 肖 军 / 164
- 《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利玛窦》邮票欣赏
伍穗生 / 175
- 中西医学交流的先驱者——利玛窦 何凯文 / 178

第四篇 利玛窦及西方传教士历史活动的影响与评介

- 从中西文化差异看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的历史偶然
余三乐 / 201
- 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重建的调查与思考 梁 骏 / 210
- 有关利玛窦遗产的最近争论 梅谦立 / 228
- 融合,会通与传播——论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朱亚非 / 240
- 耶稣会士蒋友仁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吴伯娅 / 255
- 中国天主教朝圣地的现状及省思 刘志庆 / 267
- 利玛窦的宗教传播与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 李佩环 / 290
- “第二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佩环 王超杰 / 299

第一篇

明末清初中西方 文化的相互认知与理解

从基督宗教的第三次入华高潮 到西方早期汉学的形成

耿 昇^①

摘 要：基督教的首次入华高潮是唐代的景教徒，第二次高潮是元代的方济各会士，第三次入华是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多个修会的传教士。入华耶稣会士们来自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其中以南中欧拉丁文化的国家为主。他们的社会出身一般较高贵，故来华后走上层路线，广交上至朝廷，下至文人儒士，推行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他们在传教方面收获不大，但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功不可没，对中学西渐的贡献大于其对西学中渐的贡献。他们的书简、报告和著述等，促进了西方早期的中国观的形成。

关键词：基督教 景教 方济各会 耶稣会 西方中国观

一、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

基督宗教首次传入中国，出现在唐代，其主要代表是基督宗教的一个异端派别：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e）。聂斯脱利（Nestorius，约公元380—451年）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即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双重本性，做为人的耶稣为玛利亚所生，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为神的圣子和基督并非玛利亚所生，也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①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故不能称玛利亚为“上帝（天主）之母”。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基督宗教世界性主教会议）将“二性二位说”定为异端，聂斯脱利因此被割职流放，其追随者们遭到了迫害。聂斯脱利派信徒已无法向西推进，只好向东逃亡，活动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印度等地区。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获得了蓬勃发展。聂斯脱利派于唐代传入中国，在中国被称为“景教”。至于“景教”的“景”字之意义，学术界尚有争论，莫衷一是。

1623年（明天启三年）或1625年（明天启五年），于陕西省西安府盩厔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这次传播的明证。该碑由大秦寺（景教寺）僧景净（景教徒景净）述。其中提到“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去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明明景教，言归我唐。翻经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万邦之康”。“更效景门，依仁施利……餒者来而飫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此外，在敦煌藏经洞中，也发现了景教卷子。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老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天）论》、和《大秦景教大圣真归法赞》等景教早期经文。

但唐代的景教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持续发展下去。到了元代，蒙古汪古部的阔里吉思王子家族信仰景教，最后导致整个蒙古汪古部接受景教归化，从而才使景教得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延续了较长时间。

基督宗教向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潮约在13—14世纪的中国元代前后，其中在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宗教，以天主教的方济各会为代表。

方济各会是由意大利人方济各（Francesco d' Assi, 1181—1226年）创建的。1209年，他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年）批准，该会也被称为“小兄弟会”；由于他们身穿粗布衣袍，手托乞食钵，赤足行走，故该会会士又称为“托钵僧”。方济各会士们曾于1212年又协助加辣（Chiara, 1193—1253年）创建方济各第二会，即方济各女修会。他们分别于1221年和1223年制订了第1部和第2部会规。方济各早期的活动地域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以及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埃及地区。

在13世纪时，蒙古人征服了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蒙古铁骑于1236年灭卡马河畔的不里阿耳突厥王国，1238年攻陷莫斯科，1239年征服南俄罗斯草原，于

1240年灭乞瓦（基辅国）。他们于1240—1241年甚至打到勃烈儿（波兰）和马札尔（匈牙利），一度曾兵临奥地利维也纳城郊。波兰与日耳曼人联合抵抗蒙古人的征战，于1244年遭到惨败。西方基督宗教世界对此惶惶不安，急欲派出“间谍”，去刺探蒙古人的实力、军情、动向、作战韬略、军械设备等。此外，西方基督宗教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宿敌——伊斯兰世界，他们彼此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在1096—1291年的近200年间，基督宗教世界向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动过8次“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崛起，奴隶王朝与非斯马林王朝日益发展壮大，促使西方基督宗教国家千方百计地设法与蒙古人结盟，以图共同从东西两侧夹击伊斯兰教的势力。此外，西方基督宗教世界还流传说，东方有一位约翰长老（Prêtre Jean），正率基督教的军队与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作战，西方也急欲派人去联络约翰长者。在此背景下，西方基督宗教世界便不断地向当时蒙古帝国遣使，大部分使者均为方济各会士。笔者于下文就介绍当时东来的几位主要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士。

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诞生于今意大利的佩鲁贾。他于1245年4月16日（复活节）时，根据里昂主教会议的决议，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1243—1254年）的教谕，在65岁的高龄时，从里昂登程，先到达波兰的布雷斯劳，携其波兰教友和翻译本笃（Benoît）一并出使蒙古。他们从西欧到中亚，万里跋涉，最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了钦察汗国的缔造者拔都（Batu，1227—1256年）的幕帐。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嫡孙，即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占据咸海、里海至额儿齐思河一带。随后柏朗嘉宾被拔都差往喀喇和林（成吉思汗曾建都于此），于同年8月24日到达那里，有幸参加蒙古定宗贵由汗的登极大典。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机缘。因为贵由是太祖成吉思汗之孙、太宗窝阔台之子。柏朗嘉宾一行又于1246年11月3日离开喀喇和林回国，于1247年11月24日返回巴黎。柏朗嘉宾奉使蒙古，共历时两年半。教皇英诺森四世委托这位方济各会士携带致蒙古大汗的国书，要求蒙古人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并希望与蒙古人结盟，共同抗御伊斯兰教的扩张。这颇有一点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氏人，以图“断匈奴右臂”之策略。柏朗嘉宾的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的使命没有实现。贵由汗不但想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反而奉劝罗马教皇改宗信仰佛教或萨满教。柏朗嘉宾归国后写成的出使报告《蒙古史》，却成了西方第一部有关蒙古帝国和东方民族史与人类学的名著。书中囊括了当时西方所知道的有关蒙古人和东方的全部资料，

他凿通了西方基督宗教世界通向东亚和中国的道路。

鲁布鲁克 (Guillaume de Rubrouck, 1215 年左右 - 1257 年) 也是方济各会士。他诞生于佛兰德, 却为法国公民, 也是路易九世 (Louis, IX, 1214 - 1270 年), 即后来的圣路易的挚友。他获悉成吉思汗后裔的一位蒙古王公 (可能是曾征高丽的蒙古将军撒里达, ? - 1232 年) 接受了基督教的归化, 于是便携带路易九世致蒙古大汗一封要求他接受基督宗教归化的国书, 于 1253 年 5 月 7 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 前往位于当时俄罗斯南部亚美尼亚的苏达克会见该王公。他接着又被差往蒙古大汗牙帐, 到达喀喇和林, 会见了蒙哥汗 (Mongka, 1208 - 1259 年)。他在喀喇和林居住数月之后, 携带蒙哥汗致路易九世的一封信归国。蒙哥汗在国书中, 不仅拒绝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 而且还要求路易九世接受成为蒙古人的附庸。鲁布鲁克归国之后, 又以上表的形式, 向国王呈奏了其出使报告《蒙古帝国行记》。此书既显示了他的文学天才, 又揭示了这次出使的政治目的。鲁布鲁克应为中法关系史上的第一位官方使者。他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步行和骑行 16000 多公里, 从君士坦丁堡到达喀喇和林, 从一个游牧部族跋涉到另一个部族。但他并没有特别炫耀其官方头衔, 只是自称为“上帝最卑微的仆人——方济各会士”。这一切都使蒙古人感到震惊, 也反映出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因差异而造成的撞击。

约翰 (若望) · 孟德高维诺 (Jean de Montecorvino, 1247 - 1328 年) 是意大利塞莱诺的方济各会士, 他是哲学和神学专业毕业生, 精通多种东方语言。1289 年, 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 (Nicolas VI, 1288 - 1292 年) 的派遣出使中国, 这是为了响应元世祖忽必烈 (Qubilaï, 1271 - 1294 年) 向教皇提出的派遣传教士赴中国的请求。孟德高维诺经过断断续续的漫长旅行 (在印度一次就滞留 13 个月), 于 1294 年才到达汗八里 (元大都北京), 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召对并钦准他在元帝国中布道。他后来于 1307 年被任命为汗八里和东方的主教, 并在那里设立了主教府, 归化了一大批信徒。他与蒙古汪古部的阔里思王子交往甚笃, 并使该部族接受归化而成为景教徒。他于 1305 年和 1306 年间, 多次请求教皇派遣传教士去支援他, 并索求《圣经》各书和宗教仪轨用品等。教皇于 1311 年向他派去了多名方济各会士, 包括笔者将于下文介绍的安德烈·德·佩鲁贾。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华生活 34 年, 最后逝世于中国。他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首任主教, 也是方济各会士们在中国所获得的最大成功。

鄂多立克 (Odoric de Pordenone, 1286 - 1331 年) 是一位出生于捷克或波希米亚家庭的方济各会士。他早年就曾赴亚洲旅行, 1318 年经海路赴中国旅行和布道, 有 3 名方济各会士与他结伴同行。他于广州登陆后, 由南至北穿越大半个中国, 一直到达北京, 受到了大汗的召对并会见了孟德高维诺。经过在北京居住 4 年后, 他又奉命返欧洲, 以为中国传教事业招募新的传教士。他经陆路, 通过西藏和拉萨道, 于 1330 年返回阿维尼翁。他刚刚口授完其旅行记, 便过早地辞世了, 享年 45 岁, 被教皇列为“享真福品者”。其旅行记对于北京、泉州、长江、杭州、戈壁沙漠、西藏等地的描述准确而详细。他首次称杭州为“远东威尼斯”, 与马可·波罗首次称苏州为“东方威尼斯”一样成为西方的流行语。

安德烈·德·佩鲁贾 (André de Pérouse, ? - 1326 年之后) 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 属于由教皇克莱芒五世 (Clément V, 1305 - 1314 年) 派往中国, 以赴北京支援若望·孟德高维诺的使徒之列。安德烈·德·佩鲁贾于 1311 年到达北京, 后又派往刺桐 (泉州) 传教区并出任泉州主教。他于 1326 年寄往欧洲的书简, 提供了其最后信息, 然后便杳无音信了。他坚持认为, 中国的回教徒和术忽人 (犹太人) 绝不会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 中国的“偶像崇拜者” (中国的儒释道教派信徒) 即使接受归化, 也很难进入基督教的正统。当时泉州共有 4 名修士殉教, 他们可能均为亚美尼亚人。

教皇本笃十二世 (Benoît XII, 1334 - 1342 年) 于 1338 年在法国阿维尼翁 (1309 - 1378 年, 有 7 任教皇居住在时属教皇国今属法国的阿维尼翁, 基本上受法国控制), 接见了元朝末帝顺帝妥欢帖睦尔 (Toghan Temür, 1336 - 1368 年) 的一位使节, 并且收到了其国书。教皇向中国派出了一个由 4 名方济各会士组成的使团和布道团, 其中就包括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方济各会士若望·马黎诺利 (Jean de Marignolli, 1290 - 1353 年之后)。他携带教皇谕旨和礼物, 自法国阿维尼翁登程, 经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北岸, 自陆路赴华, 于 1342 年到达汗八里, 拜谒元顺帝并献上一匹著名的“天马”。他在汗八里居住 3 - 4 年, 洞察到了元朝政局不稳, 遂取道海路, 经满刺加、锡兰和耶路撒冷, 于 1353 年返回欧洲。他为卢森堡的查理四世 (Charles IV, 1316 - 1378 年) 在《波希米亚年鉴》中发表了其游记。他于其《契丹大汗宫中的一名方济各会士》中记载说, 在汗八里, 有一座与皇宫相毗邻的方济各会的教堂。元大都还有其他教堂, 教友们都接受教皇赐给的食物。元顺帝负责承担

他回国的一切旅资，并且相托代为向教皇送礼。要求他尽快再返汗八里并出任北京大主教，但马黎诺利再也未返回中国。他成了当时教廷派往中国的最后一名方济各会士，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赴华的西方大旅行家。

约翰（若望）·伯朗嘉宾、约翰（若望）·孟德高维诺和约翰（若望）·马黎诺利，被称为元代进入中国的方济各会“三约翰”（若望），是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 - 1324 年）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和旅行家。当波罗父子离华归国时，忽必烈曾委托他们向教皇提出，为他派遣“百名七艺博学士”，并为他带回一点“教廷教堂中供像前的圣油”。由此可见，由于方济各会士们的频繁活动，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对基督宗教有了初步了解，并且还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好感。

短命的元帝国很快就崩溃了，蒙古人打通的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又被迫中断了。方济各会士们在蒙古帝国的活动，形成了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

二、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三次高潮——入华耶稣会士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第三次高潮，是从方济各·沙勿略 1552 年进入并客死于广东上川岛开始的，而其高潮则是 17 - 18 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大举入华。

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çois - Xavier，S·J，1506 - 1552 年）是西班牙耶稣会士，被称为“印度使徒”或“印度传教始祖”。他于 1506 年 4 月 6 日圣主日诞生于西班牙纳瓦拉尔省（Navarre）的首府潘普罗纳（Pamplona），于 1520 年进入巴黎圣保禄修院，1537 年在威尼斯晋铎。1541 年，他奉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Jean III，1521 - 1557 年）的敕令，做为教皇保禄三世（Paul III，1534 - 1549 年）的教皇大使出发赴远东布道。

方济各·沙勿略是耶稣会的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la，约 1491 - 1556 年）最早的教友之一，也是教祖的心腹之一，所以罗耀拉才选择他赴印度传播福音。方济各·沙勿略自 1542 年到达果阿，直至他于 1552 年客死于中国的门户上川岛，其一生中的最后 10 多年，完全投入到了印度和远东的布教事业中了，从而为多个耶稣会传教区奠定了后来兴旺发达的基础。他继在满刺加（Malacca）、马鲁古

群岛（Moluques）和日本居住之后，便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我们通过他的书简，便可以追踪其在远东活动的行踪。首先是南印度，接着是柯钦（Cochin），其后是满刺加和马鲁古，再其后又是日本。在他生命的末期，经欧洲商人的帮助，他终于成功地在广东省沿海的上川岛登陆。但他在成功地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却溘然去世了。

方济各·沙勿略死后，罗马教廷于1619年将其列入真福品，1622年又与依纳爵·罗耀拉同时被列入圣品，教皇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1740-1758年）封他为从好望角到远东传教的主保圣人，教皇庇护十世（Pius X，1903-1914年）又封他为传教区的主保圣人。他生前历尽劫难，死后名垂传教史。

方济各·沙勿略在欧洲学习和在远东的传教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①

1506-1512年间，方济各·沙勿略主要是与其家人，特别是与其两兄弟生活在一起。他们是生活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实际上是操巴斯克语，但却具有阿尔卑斯山的那种豪爽和英勇善战的性格。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钦命远航时，其水手绝大部分就是巴斯克人。方济各·沙勿略家族是纳瓦拉的望族。由于纳瓦拉地区的历史变迁非常复杂，历史上既曾被穆斯林占领过，又曾臣服过法兰克王国，也曾处于阿拉贡人的统治之下，还曾被划归法国版图，1515年被卡斯蒂利亚王国兼并，1833年才被完全归并于西班牙。1479年之后，阿拉贡王国名义上已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但实际上仍保持着议会与内阁的独立运作。所以，当方济各·沙勿略诞生时，纳瓦拉实际是依然属于阿拉贡或卡斯蒂利亚王国，而不是西班牙。其父丰·若望曾先后出任该王国的财政大臣、总参谋长和内阁总理。由于其父与当地的另一门望族阿斯比克家族联姻，故其势力非常强盛。方济各·沙勿略的两个哥哥都是武功卓著的军人，他自己却于1525年决定到巴黎求学，从而走上了传播福音的道路。

1525-1533年，主要是方济各·沙勿略在巴黎求学的阶段。方济各·沙勿略远涉巴黎之后，首先在巴黎大学学习。他在那里有幸与耶稣会的教祖依纳爵·罗耀拉成为同窗好友，并且很快成为其虔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他们诸同学中的另一位是法国宗教改革的主要领袖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方济各·沙勿略在1540年之前，基本上是在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圣保禄

① 以下资料均取自德国学者许霞漫（Gerg Schrammer）：《沙勿略传》，德国1933年版。

修院度过的，从而奠定了他终生的志愿方向。

1540—1541年间，方济各·沙勿略是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若望三世国王宫廷中度过的。他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召对，王室委托他每周至少为3岁的小王子举行一次告解神工礼仪。他虽在那里备受国王关怀，却必须准备赴印度去了。

1541年，他接到了教皇的谕旨，任命他为教皇出使东方的大使。教皇同时致信红海、波斯湾、太平洋岛屿、果阿和塞俄比亚的统治者，要求给予他特别庇护。国王也于他启程前再次召见他。4月7日，方济各·沙勿略在他35岁生日的时候，终于启程赴印度。他于1542年到达印度，其后便活动于印度和锡兰，1545年在摩罗岛，1547年又到达亚齐，1548—1549年间在果阿并出任修院院长，1549年春天到达满刺加，他于1549—1550年在日本的鹿儿岛，甚至还会见日本天皇和丰后王。

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绕道新加坡赴华，于1552年8月间到达广东海岸的上川岛之后，由于无人能把他从那里带到150公里以外的广州，故只好在上川岛的半山坡中搭草棚以临时棲身。有一个中国商人，曾索要价值200圆的胡椒，答应将他带到广州。但那个中国人后来又将要价增至350圆，而且再次约定8天之后来接他。但直到11月19日，那个中国人又爽约，不再理会他了。他由于无法从上川岛进入中国内地，故而重新计划于冬季转道暹罗，然后随暹罗入华朝贡使赴中国，再于中国内地等待葡萄牙赴华使节的到达，依靠官方的干预在华布道。方济各·沙勿略却于此期间发高烧，沉疴不起，最终于1552年12月3日，星期六，清晨两点钟时魂归天国了。

在1553—1554年间，是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辗转安葬的时期。方济各·沙勿略逝世后，当时尚留在上川岛上的葡萄牙人感到极其痛苦。第二天，他们便按照中国的方式，把他装殓入棺，并将4袋生石灰填入棺中以防腐，然后被安葬在海边空地。一切后事均由其忠实的仆人安东尼负责操办。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在上川岛安葬两个半月之后，于2月17日被葡萄牙人乘船运灵赴印度。运尸船于3月22日到达满刺加，沿途受到了信徒们的虔诚迎灵，特别还形成了方济各·沙勿略尸体不败不朽并散发异香的神话般传说。

三、继方济各·沙勿略之后，耶稣会士大举入华

16—17 世纪，正值中国的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和大变革之中。此时的欧洲殖民列强也越来越毫无节制地为瓜分海外殖民地，并为开辟海外市场而激烈争夺，在非洲和美洲大批国家和地区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他们的触角很快也延伸到了印度、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与地区，甚至想方设法地叩开中国的大门。他们一方面实行“炮舰政策”，直接出兵掠夺当时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 and 人民；同时又利用攻心战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进行渗透，“传教”或“福音化”是他们得心应手的策略。基督宗教各修会和传教会的海外传教士应运而生。

方济各·沙勿略未能实现其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的美梦，但他毕竟闯进了中国的门户，为其后来者开辟了道路。耶稣会士们继他之后，便大举入华，开创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第三次高潮。

事实上，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是 1534 年由依纳爵·罗耀拉创建于巴黎，1540 年由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1534—1549 年在位）批准，直至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ément XIV，1769—1774 年在位）颁布教皇谕旨，宣布解散耶稣会为止，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创建的耶稣会传教区被称为“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区”。1814 年，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1800—1823 年在位）又宣布恢复耶稣会，耶稣会士们重新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北京、直隶与江南、上海。本文所研究的基本上属于“耶稣会早期在华传教区”。

1、据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国籍或籍贯及其所操语言

法国原入华耶稣会士汉学家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 年）统计^①，在 1552—1800 年间，入华耶稣会士（其中有少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澳门人）975 人（分编为 920 个号）。这些传教士们主要来自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拉丁文化圈，少数来自德国、荷兰、爱尔兰、奥地利等日耳曼文化圈，也有少数来

^① 荣振华：《1552—1800 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Joseph Dehergne S·J·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1880），巴黎和罗马 1973 年版。

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还有极少数来自东欧的立陶宛、波希米亚（捷克）、波兰等斯拉夫文化圈。

据法国学者迪岱统计^①，“早期耶稣会在华传教区”中，从耶稣会士们所操的语言（因而也就是他们的国籍）方面来划分，大致情况如下：

操葡萄牙语的神父和修士有 372 人，其中有少数中国澳门人或葡萄牙混血儿，也有几名来自葡萄牙殖民地的人；

操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语）的传教士 28 人，其中有几名是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人；

操意大利语的传教士有 107 人，其中包括当时尚属于热那亚王国的科西嘉人（科西嘉后来归属法国）；

操法语的入华耶稣会士 168 人，其中包括法国南部操两种方言的萨瓦人和瓦隆人；

操日耳曼语（德语）的入华耶稣会士有 50 名，其中包括某些从东欧和中欧出发的操德语的传教士；

操佛拉芒语或荷兰语入华耶稣会士有 18 人；

操斯拉夫语的入华耶稣会士有 12 名，大多数为波兰人；

操英语的入华耶稣会士只有 3 人，其中包括一名爱尔兰人；

耶稣会士中有 40 名中国血统的人，大部分为助理修士，其中至少有 4 名是澳门葡萄牙混血儿。

有 10 名入华耶稣会士除了操其母语之外，还会讲另一种亚洲语言，如越南语、日语和朝鲜语等。他们的国籍比较复杂，很难作出唯一断定。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远没有葡萄牙人多，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在中国和欧洲的影响都比较大。从时代上来划分，他们的人数大致如下：

在康熙皇帝（1662 年 2 月 18 日）之前，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的人数继葡萄牙人（136 人）和意大利人（50 人）之后，位居第三（26 人）。在康熙时代（1662 年 2 月 18 日至 1723 年 2 月 5 日），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数跃居第二位（90 人），仅名

^① 迪岱（Jean—Pierre Duteuil）：《上天的使命，入华耶稣会士的作用》（Le Mandat du Ciel, Le rôle des jésuites en Chine），Paris, Argumenes, 1994 年版，第 20—26 页。